

扬帆词海苦作舟

——李锡胤教授的词典人生

张春新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李锡胤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词典学家, 在词典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从3个方面对李锡胤教授在词典学方面的建树进行回顾和总结, 以此表达对先生的追思和怀念。

关键词: 李锡胤; 词典编纂; 词典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识码:** A

李锡胤教授生于1926年5月, 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词典学家, 是第一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因其在学术研究和词典编纂等方面的卓越贡献, 曾多次获得省、市级劳动模范称号, 曾担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获得普希金奖章, 他的传记被收录到《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英文版》。

李锡胤教授涉猎广泛, 精通多门外语, 翻译了《聪明误》(俄: 格里鲍耶多夫)、《老人与海》(美: 海明威)、《伊戈尔出征记》(古俄语文献)、《现代逻辑》(法: 布莱斯·格里兹), 与人合译《俄罗斯抒情诗百首》、科学院《俄语语法》(苏)、《词的语法学说导论》(苏: 维诺格拉多夫)等。他在国内较早地把符号学、逻辑学的方法引入语言研究领域, 在数理逻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哲学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受家庭熏陶, 酷爱中国古代文学, 自编《霜天星影李锡胤诗存》, 喜好书法篆刻, 堪称是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学者。本文主要回顾李锡胤教授在词典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李锡胤教授的词典编纂实践

辞书是供人查检的知识体系, 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 承载着人类的知识世界, 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辞书这一文化产品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编者。古往今来, 众多词典精品流芳百世, 泽被后人。这些词典的诞生往往凝聚着编纂者数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的心血, 而编纂工作之艰辛又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因此, 我国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 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 它是圣人干的。李锡胤教授毕生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这项“圣人的苦役”。

李锡胤教授的词典编纂实践工作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他凭借着自己对词典事业的执著与热爱, 以及通晓英、俄、法语, 谙熟社会学、人类学、诗词学的深厚根底, 在50多年的辞书编纂活动中编纂了多部重要的词典, 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作就是黑龙江大学词典编辑室编纂的两部大型俄汉词典《大俄汉词典》和《俄汉详解大词典》。由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大俄汉词典》的编纂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耗时十载, 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词典出版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誉为“具有创世纪意义的词典”。在这一工作结束之后，他又和赵洵、潘国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俄汉详解大词典》，这部词典是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并通过文化部与苏联有关部门达成了合作协议，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资深学者参与编纂，编纂工作历时13年，于1998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如今，《大俄汉词典》和《俄汉详解大词典》已成为每一个俄语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大俄汉词典》荣获首届中国辞书奖一等奖（1995），《俄汉详解大词典》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及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1999）。《大俄汉词典》出版发行时，前苏联有5种杂志进行了报道介绍；《俄汉详解大词典》更是被作为国礼赠送给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除了上述两部词典，李锡胤教授还是《苏联百科词典》中译本译审委员会副主任，《俄汉成语词典》《俄语新词新义词典》《外国文学大词典》的编者。这些词典作品是李锡胤教授毕生词典编纂工作的辛勤结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体现了他作为一位辞书人不断追求、不停进取的精神，也充分展示了他在词典编纂实践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正是在李锡胤教授这一批老一辈辞书人的引领下，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的词典编纂实践活动才能够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二、李锡胤教授的词典学理论研究

词典学是一门具有独立理论框架的交叉性应用学科，与词典编纂实践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位有着数十年词典编纂经验的资深编者，李锡胤教授一直对词典学理论孜孜以求，力求在编纂实践中总结词典学理论问题，并将理论应用于编纂实践活动，以便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二者的结合。他著有多篇学术论文，涉及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多个方面，其中论述较多且较为系统的有以下3个方面：

1. 对词典学一般理论的引介

李锡胤教授对词典学理论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对俄罗斯词典编纂实践经验的介绍。俄罗斯是世界上公认的词典强国，在词典编纂实践方面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尤其是科学院词典，参与词典编纂的大多是俄罗斯科学院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们编纂的几部科学院词典无论从权威性、还是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都堪称经典之作。在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四卷本《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57—1961）刚刚出版之后，李锡胤教授就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评价该词典为“水平相当高的词汇工具书和俄语词汇学、语文学方面的科学著作”（李锡胤 1963：67），并对该词典的收词原则、注音和形态特征描写、句法特征标注、动词对应体的处理方式、修辞标注体系、词义解释和例证等多方面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用他自己的话说，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有助于我国读者利用这部词典”，但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篇文章不仅仅对于词典使用者来说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使用指南，对于词典学研究者和词典编者来说，更是一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标准语详解词典编纂原则和方法的详实阐释。

在《词典的广度、深度、词义层次及体系》一文中，他向国内词典学研究者介绍了《历史性梵语词典》主编 S.M. Katre 教授在其所著的《词典学》（Lexicography, 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覆盖广度”和“覆盖深度”这两个概念。覆盖广度是指词典所收录的词汇单位，体现在词典的左项之中，而覆盖深度指的则是对词汇单位在各种语言环境中的功能意义的区分与描写，体现在词典的右项之中。此处“左项”和“右项”两个概念是由苏联学者 B.Г. Гак 提出的。李锡胤教授将不同国家词典学者的研究有机地、系统地融汇在一起，深入浅出地阐明词典广度和深度之间的相对性，比如词典收词多寡的问题，看似是广度问题，其实也包含深度问题，因为收词体现了语言词汇的系统性，而收词不成体系，不仅会使词典的覆盖面“体无完肤”，而且深度也参差不齐。因此，在词典收词的广度问题上，他特别强调要注重时间、地域、文体、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几个轴线，避免收词“太吝”和“太滥”两种极端做法。

在阐明“覆盖深度”这一概念时，他借用了俄苏词典编纂理论中的“词义、意味、用法”这种词义划分方式，指出“词典要正确区分同音现象和多义现象；词条中要区分出各义项；义项中要区分出各意味和‘用法’——这样就使词条成为多层次的结构，形象点说，成为立体的了”。（李锡胤 1986：8）这种释义方法被他身体力行地应用在他主编的《俄汉详解大词典》中，在该词典的编纂细则中明确写道：“采用多层次释义法，区分出意义、意味和特用三个层次”；“意义和意味、用法不在一个平面上。意义是总括的。意味用‘|’号隔开，加解释，注意传达其细微差别。特用用‘|’号隔开，一般不给解释，有时给解释或翻译，或加‘指……’”。这种释义方法使《俄汉详解大词典》在我国双语词典之独树一帜，更加符合双语词典的特点和中国读者的需要。在首次对词典广度和深度问题进行探讨之后，时隔20年的时间，李锡胤教授在《辞书中的十组关系》一文中，对这两个概念给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即广度指辞书中收录的语言单位有多少，而深度指辞书所包含的信息量。同时还对“断代和历代、能指和所指、严师和益友、求解和应用、规则和特例、纵轴和横轴、定义和详解、单语和双语、体式和内容”（李锡胤 2005：2—9）等其他九组关系做了介绍。这九组关系分别指的是新词和旧词、普通词汇和专业词汇、规范性原则和描述性原则、积极词典和消极词典、合乎规则的语言现象和不符合规则的特殊语言现象、词的纵聚合（词形族、同义—反义、上位—下位、整体—部件）关系和横组合（搭配）关系、释义方法、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区别特征、条目排序方式和词典中插图、表格等内容设置等几个方面，李锡胤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些词典学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总括性的阐述，这既是他一生词典编纂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词典学理论研究的高度概括，对于词典学研究者和词典编者从总体上了解词典学理论和词典编纂的一般原则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2. 对词典中语义问题的探讨

李锡胤教授所发表的著述，虽然每一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从整体上看，其实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如何在词典中更好地描写词义，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关于词典学一般理论探讨的文章，都涉及到语义的问题，如《词典的广度、深度、词义层次及体系》一文中提到的词义结构问题、《辞书中的十组关系》中提到的定义和详解的问题等。他明确指出：“广泛地说，词典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与语义有关系，但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词义解释或给词下定义上”（李锡胤 1997：1）。

对于词义解释或给词下定义这一任务来说，词典编者本身对词义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李锡胤教授强调，编者自己必须首先要“吃透”词义，才能给查词典的人讲清词的意思，而不应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指出，编者要从下列几个方面理解词义：1）实物理解：即弄清词指的是什么东西，这是理解词义最根本的要求；2）概念的理解：即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感情色彩和联想色彩；3）文化—历史背景的理解，即关注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情下的意义；4）词源的理解，因为词源对于词义来说虽然并不是最主要的和永远的决定因素，但却或多或少会在词义中留下痕迹；5）词汇—语义学的理解：指同义—反义关系、近义关系、同根关系、同前后缀关系，同音异义关系，多义性问题等，这需要编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6）语法的理解：指与某些特定语法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词义；7）语境的理解，即某些词语需要根据语词使用的具体上下文理解词义；8）语用的理解，指表达说话者对话语内容以及听话者的态度等等有关系的词或词义的理解，例如俄语的指小（表示爱昵）和指大（表示谦卑）的词汇；9）语义比较的理解，这指的是在双语词典中，要从词汇意义出发比较两种语言的异同。（李锡胤 1988：56—62）

上面有关词义理解的9个方面，李锡胤教授曾撰文对其中的某些层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其中探讨最多的便是词义对比的问题，他将其称之为“双语词典的灵魂”。他认为：“双语词典作为一种词典类型，特点就在于条目中被定义者与定义者是两种语言手段。因此双语词典中词义反映得正确与否，精确程度如何都取决于两种语言词汇的语义对比”（李锡

胤 1980: 69), 而词汇的语义对比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从词的某一意义与另一种语言中对应词的对应意义进行对比; 第二, 从同一语言中对应词义的对应关系及联系为一方面, 与另一语言中对应词义的对应关系为另一方面来进行对比, 前一种我们称为意义的对比, 后一种称为意值的对比” (李锡胤 1980: 71)。李锡胤教授将词义分为四类: 1) 事物—现象的名称: 名词词义; 2) 性质的名称: 形容词、表示性质的抽象名词等的词义; 3) 动作—状态的名称: 动词、动名词等的词义; 4) 关系的名称: 介词、连词及表示关系的名词、形容词等的词义。通过语义对比可知, 这四类词义都有一部分词义在另一语言中没有“等价物”, 李锡胤教授通过俄汉两种语言对应词的语义对比举例说明了双语词典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 他还指出, 双语词典应该像单语词典一样, 从索绪尔提出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语义场关系等方面客观地反映词在词汇系统中的“价值”。

无论是词义对比, 还是词义理解, 其目的最终还是更好地进行释义。在对双语词典的释义理论进行探讨时, 李锡胤教授特别关注到名物词的释义问题。他将双语词典中名物词的释义方式归结为四种: 第一种方式是提供对等词的方式, 如 *гора*——山。第二种方式是内涵定义, 词的内涵通过义素分析法来确定, 包括 1) “属+种差”式逻辑定义, 如 “*локатор*——(中世纪经封建当局准许而) 开办移民居住地的人”; 2) 描写法, 如 “*альпака*——铜、镍、锌合金”; 3) 功能定义, 即指出事物的用途和目的, 如 “*цвин*——鞋匠修鞋时把鞋后跟钉在木植上进行加工时用的钉子”等。第三种方式是外延定义, 如 “*бельё*——内衣; 床单, 枕巾; 餐室用的桌布、餐巾”。第四种方式是列举若干同义词或近义词揭示共有属性, 如 “*жениться увозом*——抢亲; 拐骗结婚; 卷逃结婚”。(李锡胤 1982 19: 25)。上述四种方法中, 后面的三种和单语词典对名物词的释义方法是一样的。他认为, 传统的“属+种差”的方法给名物词下定义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种差五花八门, 有时很难确定哪一个才是最有代表性的, 因此除了传统的释义方法, 可以采用原型释义法。他指出: “原型有两个条件, 1) 它具有同类成员最普遍具有的特征; 2) 该特征是异类成员最难具有的”(李锡胤 1997: 2), 他将这种特征称为“族征”, 同属的成员所具有族征的多寡也并不相同, 比如, 同属水果的苹果、梨、香蕉、葡萄、橄榄中, 作为原型的苹果和梨的共同族征较多, 与橄榄的相同点则很少。

3. 对词典中语用原则的阐述

作为语言高度形式化研究的反作用, 语用学蓬勃兴起,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词典编纂提出了新的要求, 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当代词典学理论与实践, 词汇研究的语用学原则受到越来越多词典学家的关注。李锡胤教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 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指出, 词在结构和语义方面的不断变化是语用变化的结果, 语词符号的应用不仅是其结构和语义系统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而且是形成和改变后两个方面的动力。因而, 当代词典的编纂必须着重于反映词的用法, 而从语用方面着眼来编纂词典, 至少须详细而系统地反映词的下列几种用法: 1) 与语义引申相关的用法特点, 尤其是带普遍性的引申用法; 2) 与句型相关的用法特点, 比如具有熟语性特征的非自由搭配词组; 3) 与形态学范畴相关的用法特点, 比如“可数”和“不可数”、“用单数”和“用复数”的问题; 4) 由于内部形式两可理解而引起的用法特点; 5) 与不同使用场合相关的用法特点; 6) 由于视角不同而出现的用法特点; 7) 由于词义十分笼统而引起的用法特点。(李锡胤 1996: 42—44) 针对上述的每种情况, 李锡胤教授都举出了典型的例子, 并加以分析说明, 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语用原则在反映词汇单位的意义和用法时的重要作用及其在词典编纂中的具体体现。

在当代词典学中, 关于语用信息的研究越来越充分, 语用信息的类型划分也越来越细致, 例如章宜华将语文词典中的语用信息划分为语言外部环境、语体和语域等方面的内容, 具体又细化为社会环境、地域环境、时域环境、语言环境、专业环境五个方面 (章宜华, 雍和明 2007: 124—126)。李锡胤教授所谈到的语用原则更倾向于词的特殊用法, 这些特殊用法中

与语义引申相关的特点便是语言环境中的语义修辞类语用信息,与不同使用场合相关的用法特点属于社会环境中的语体或语域信息。关于这些用法原则,在他的《多层次反映词义结构——谈〈俄汉详解大词典〉的释义结构》一文中也有相关的阐述(李锡胤 2000: 25—29)。总之,李锡胤教授是我国较早关注词典中语用信息的研究者,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三、李锡胤教授独特的“词典—小说观”

很多人都认为,编词典是非常枯燥的工作,就像是“做苦工”一样,而李锡胤教授却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词典比小说更引人入胜”。这种对词典及词典编纂工作“甘之如饴”的境界,恐怕不是一般词典工作者能够达到的。

李锡胤教授独特的词典观体现在他的《词典中的婚事马赛克》一文中。他将俄国 19 世纪最著名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习称《达里词典》)中有关“婚事”的词语、俗语及例证收集起来,生动描绘了一幅由婚礼酝酿、相亲、请媒人、许婚、举行婚礼、婚后酬宾、回门等等一系列活动构成的俄罗斯民族传统婚礼的画卷。例如,最初男家开始酝酿(семейный совет),派一名“空口媒人”(пустосват)非正式地向女方兄弟悄悄探听口气,说“你家中有什么货色,我手头有买主”(У вас товар, а у меня купец)。接着介绍“他家什么都有,只缺了飞鸟的奶”(только птичьего молока нет)之类的情况,反正“做媒就是得吹大牛”(сватать, так хвастать!)等等。(李锡胤)词典中这些语料都是离散的,而李锡胤教授不仅从浩瀚的词典语料中将它们整理出来,还按时间顺序构架成了有完整情节的小故事。这个摘录、整理、拼接的整个过程的确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词典编纂范畴,上升到了“小说创作”的层次了。不用说词典中所涉及到的反映 19 世纪的俄罗斯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词语、谚语、俗语等的理解需要多么丰富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俄语功底,单单是静下心来将一部大部头的词典通读一遍甚至更多遍,这个行动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锡胤教授从阅读词典和繁重的词典编纂活动中体验到了真正的乐趣,他本身渊博的学识则在他的词典学研究提供了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他的“俄语词典与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一文,正是在他翻译了《聪明误》一书的基础之上才得以成文的。他深厚的逻辑学功底则反映在《郝恩贝:他的词典与动词型式》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李锡胤教授再次阐述了他的“词典比小说更引人入胜”这一观点。他认为,词典也是有“主题思想”和“故事线索”的。郝恩贝《流畅英语词典》的“主题思想”便是编者所说的“……在培养说、写、读三种语言技能上给予学习者最实用的协助”,而“故事线索”则是贯穿词典中动词条目的二十五个动词型式。李锡胤教授将现代逻辑的三个部分——类逻辑、谓词逻辑和关系逻辑——与述语的最基本的三个范畴——实体范畴、属性范畴、关系范畴——一一对应起来,用抽象逻辑推理公式的形式列出了 25 个述语表达手段转换模式,他还将这些模式与郝氏词典做了对照,并在郝氏词典里找到了这些动词型式。

由此可见,对李锡胤教授来说,词典并不仅仅是工具书,还是将词典学、语言学、逻辑学、语言国情学、文学乃至更多学科知识集于一身的集大成者,他非常赞同苏联词典学家的观点,认为词典学作为一门应用语言科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词典中的每一个词条都是一篇“小小说”(李锡胤 1988: 23)。只有像他这样真正欣赏词典、热爱词典编纂事业的人才能发现这种乐趣。

四、结语

李锡胤教授埋首于词典编纂工作 60 多年,编纂了多部大型俄汉词典,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编舟者”,而在词海泛舟的同时,他笔耕不辍,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探讨了词典学理论问题,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并举的词典工作者。他曾在文章中写到:“谢尔巴院士一方面

为词典工作者‘正名’，认为他们是‘作者’，而不仅仅是‘编者’，另一方面一直主张编词典的人必须热爱自己的专业，把它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把每一个条目写作一篇真正意义的论文。”（李锡胤 1988：62）他本人则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词典人的使命，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甘愿“虫鱼之役，病于夏畦”（李锡胤 2000：29），而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他只是以“知我罪我，悉听读者”（李锡胤 2000：29）一言蔽之。

笔者从本科开始就读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有幸亲耳聆听了李锡胤教授讲授的课程，他也曾对我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作出耐心的指导，他谦逊的为人、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后辈学者。正如上文所说，李锡胤教授一生涉猎广泛，在众多领域都有建树，如果总结起来，也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如词典般严谨，如小说般丰富。本文仅仅撷取其中的一个方面加以简述，以此向先生致敬。

参考文献

- [1]李锡胤. 介绍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63(2).
- [2]李锡胤. 双语词典的灵魂——语义对比[J]. 辞书研究, 1980(2).
- [3]李锡胤. 双语词典中名物词的释义[J]. 辞书研究, 1982(4).
- [4]李锡胤. 词典学中的矛盾——百科性释义——插图[J]. 外语学刊, 1986(4).
- [5]李锡胤. 双语词典的配例问题[J]. 辞书研究, 1988(2).
- [6]李蕴真, 李锡胤. 双语词典与语义比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4(3).
- [7]李锡胤. 词典中的语用学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1).
- [8]李锡胤. 词典中的几个语义理论问题[J]. 辞书研究, 1997(5).
- [9]李锡胤. 多层次反映词义结构——谈《俄汉详解大词典》的释义结构[J]. 辞书研究, 2000(1).
- [10]李锡胤. 辞书中的十组关系[J]. 辞书研究, 2005(1).
- [11]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Sailing in the Ocean of Words

—— Prof. Li Xiyin's Life in Lexicography Research

Zhang Chunxin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 Xiyin is a famous lexicographer in China. He has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xicography that will be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 remembrance of Prof. Li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i Xiyin; dictionary compilation practice; lexicography theory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词典编纂史研究”（19BYY2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春新（1975—），黑龙江省宾县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词典学。

收稿日期：2023-01-12

[责任编辑：信 娜]